

认知·国学经典书系

三国史话

吕思勉 著 白立超 导读

雷原 白金钟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认知·国学经典书系

二 三 国 史 话 一

吕思勉○著 白立超○导读

雷原 白金钟○主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史话 / 吕思勉著; 雷原, 白金钟主编;
白立超导读.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7

(国学经典书系)

ISBN 978-7-220-10158-8

I. ①三… II. ①吕… ②雷… ③白… ④白…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三国时代 IV. ①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9678 号

SANGUOSHIHUA

三国史话

吕思勉 著 白立超 导读
雷原 白金钟 主编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封面设计
版式设计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赵 静 邹 近
王 聪
介 桑
杨艳菲
张 辉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北京新生代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145mm×210mm

7.25

160 千字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158-8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序

正值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际，雷原教授计划选择一批民国时期的书籍，附之以导读进行出版，我非常支持，很乐意为他的这一出版计划写几句话。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历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农耕文化与西方商业文化的较量，历经一百八十年的西风东渐，西方商业文化已主导整个世界。然而西方商业文化主导下的世界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致使全世界也包括中国面临着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异化危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已面临严重威胁。随着对西方商业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开始关注东方，希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类找到出路，这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带来巨大的历史机遇。

然而，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事业，许多人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疑虑，诸如反转基因农业问题、中医与西医选择问题、市场经济价值规律与“君子喻于义”矛盾问题、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不外乎：第一，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几千来的历史与文化，以“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这种简单化的二分法思维来对待中华几千年以来的历史文化是不行的。传统文化伴随历史的发展变化，有所损益或者创新，不能因为历史上的很多东西不能被今天的现实所用，就说它是糟粕，这种认识有悖于历史，也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述而不作的精神。第二，科学与自然之道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自然之道与科学之间，我们应视科学为第一原则，还是视自然之道为第一原则呢？第

三，在农与商之间，孰主孰次的问题，更确切地讲，在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谁是第一位的？两者兼顾自然是对的，但何者居于主导，何者处于从属？

上述这些问题，如果在今天都能得到深刻的反思，得到明确的答复，我想大概中华传统文化离真正复兴的日子就不远了。历史不能割断，我们不仅要对中国文化几千年之历史进行研究，从对历史的研究中、反思中形成我们今天的思想，还要借鉴历史中曾经有过的类似今天这些问题的研究与成果，使人们能更好地继承前人的经验。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会使我们少走弯路，也站得更高。

其实民国时期，对上述这些问题就有过争论，诸如科学与玄学的争论，玄学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之道；对于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辨；还有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

对民国时期人物及其著作进行梳理，有助于促进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也可以说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捷径。如果能借鉴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想，一定会对今日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事业大有裨益。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非常赞同研究民国并出版相关民国的书籍，如果全社会能借助这些书籍对民国时期的思想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将有助于我们的传统文化早日复兴。

楼宇烈

目 录

三 国 史 话

《三国史话》导读 /	001
楔 子 /	017
宦 官 /	020
外 戚 /	027
黄 巾 /	034
历史和文学 /	042
后汉的地理 /	044
董卓的扰乱 /	049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	058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	068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	074
赤壁之战的真相 /	083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	092
替魏武帝辨诬 /	102
从曹操到司马懿 /	110
替魏延辨诬 /	116
姜维和钟会 /	123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	129
司马懿如何人 /	134
司马氏之兴亡 /	139
晋代豪门斗富 /	143

后汉乱源与三国始末	/	148
袁曹成败	/	162
论魏武帝	/	167
曹嵩之死	/	170
关羽欲杀曹公	/	172
孙策欲袭许	/	174
边章、韩遂	/	177
张纯之叛	/	179
诸葛亮南征考	/	181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	186
李 邈	/	190
姜维不速救成都	/	192
马 钧	/	194
三国之校事	/	196
魏氏衰乱	/	200
蜀魏之亡	/	207
孙吴之亡	/	218

《三国史话》导读

白立超

《三国史话》是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唯一一部通俗性史学作品，自问世以来，在史学界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甚至被许多学者视为历史学家撰写通俗读物的典范。

一、学术根底深厚

《三国史话》能够成为史学通俗作品的经典，首先应当归结于作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和精湛的史学修养。吕思勉，字诚之，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曾用笔名骛牛、程芸，等等。1884年2月27日，吕思勉先生出生于江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6岁开始入私塾学习，12岁由于家道衰落，遂由其父母亲自教授，接受了非常系统而扎实的旧学教育，精通经、史、子、集。16岁时，开始自学古史典籍，每读一书，都能从头至尾，善始善终，吕思勉先生称“此为我

自读书之始”。23岁时，选择以史学作为自己终身的志业，先后在东吴大学、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学学校、上海沪江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起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除因“一·二八”事件短暂前往安徽大学任教外，一直在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上海光华大学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先生继续任教，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级教授。1957年10月9日，73岁的吕思勉先生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

吕思勉先生的文献功底可能是近代以来学者中罕有的，他对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古籍非常了解，尤其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史部，更是信手拈来。早在1941年时，就有人称其熟读“二十四史”。但是吕思勉听到这些话后，立刻进行了纠正，说：“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二遍而已。”我们都知道，“二十四史”是中国史学最基本的典籍，共计3259卷，内容浩瀚，近代以来很少有人能真正通读一遍，但此时57岁的吕思勉已经至少读了两遍，有些更是读了四遍。不仅如此，他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廿二史札记》《通志》《通典》《昭明文选》等典籍也非常熟悉，此等史学功底可以说让现代许多历史学研究者汗颜，难以望其项背。不仅如此，他对新学也有涉猎，如《瀛环志略》《海国图志》等近代名作也一一通读，视野非常开阔，远非一般学者能及。

吕思勉先生一生以史学研究为志业，对中国通史、断代史、民族史、学术史、思想史以及史学史都有深入的研究，也是最早以白

话的方式书写本国史的近代历史学家。通史类的著作包括《白话本国史》（四册）和《中国通史》（两册）两种。其中，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最负盛名，《吕思勉读史札记》最具史学价值。另外，还有《中国民族史》《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价》《文史通义评》《经子解题》《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制度史》《理学纲要》，等等。吕思勉先生一生著述量超过 1000 万字，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断代史系列中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两部，吕思勉先生已经进行了史料的初步准备与摘录，但由于晚年体弱多病而未能继续完成，无论对吕思勉先生个人，还是对中国史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若假以天年，吕思勉先生完成了他的六部断代史的皇皇巨著，那将是史学界的一件盛事。

至于吕思勉先生的史学地位，严耕望先生说：“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和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大家。”所以吕思勉先生被誉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足见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中的地位之高。

二、《三国史话》的撰成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史学创作方面也是如此。现在有很多通俗类的著作，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就在于这些作者本身的学术功底并不扎实，甚至为了迎合大众，流于庸俗。历史通俗作品与学术专著相比，主要的区分在于表现形式上，而非内容本身。历史通俗作品更多要求语言流畅，表述生动，可读性强。而

其在学术精神、史学卓见等方面与学术专著则是一致的。所以说，通俗并不等于庸俗，甚至通俗作品有时比学术著作更能表现出作者的专业功底与史学素养。很多学者可以写出非常精深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但是在通俗著作方面却未见得有成就，所以史学通俗作品主要在于深入浅出。

深入，即在相关方面有非常专业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这是通俗作品之根。在撰写《三国史话》之前，吕思勉先生已经出版了著名的《白话本国史》，并接连发行了四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经子解题》（1926）、《先秦学术概论》（1933）、《中国民族史》（1934）已经完成。在撰写《三国史话》期间，断代史著作《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以及《吕著中国通史》（上）（1940）、《吕著中国通史》（下）（1944）也在写作或者酝酿中。所以，我们认为至少《三国史话》是吕思勉先生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学术成果的另一种体现。正如虞云国先生所说：“史学大师吕思勉既有代表其学术高度的《两晋南北朝史》，又有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各擅胜场，令人叹绝。比起吕思勉那样著作等身、创见迭出的大师，我等只有汗颜的份儿。”张耕华指出：“吕先生的《三国史话》，实在是他《秦汉史》的副产品，融入了许多他独特的研究心得。”“吕先生的这本《三国史话》，看似平常无奇，其背后都有他一番求索考订的功夫，尤其是要纠正一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的观念，揭示了一些为人忽视的史事真相。”

浅出。在撰写《三国史话》时，吕思勉先生也意识到专业学术著作并非是所有读者能够接受和适应的，所以他在《历史与文学》中讲道：“所以有史学天才的人，听了我的话，固然不会比听《三

国演义》乏味。就是通常人听了我的话，也不一定会觉得乏味的。因为历史上有许多问题，原是普通的问题。人人能够了解的，学问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于此。”吕思勉先生之前在撰写《白话本国史》时积累了丰富的白话文撰写经验，因此他有足够的自信讲这样的话。他的遣词造句非常注重口语化、生活化，甚至使用一些生活的例子打比方进行说理。比如他反对人们认为有血缘关系的人往往情感深厚是自然而然的，他更多注重社会化的过程，他讲道：“假如血缘有关系的人，其间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天性存在。那么，把小孩从小送入育婴堂里，为什么长大后，不会自然认得其父母呢？所以现在伦理上所谓天性，无不是事实所造成，根本没有一件是生来就有的性质。读者诸君一定要驳我，说别种性质都可以说是事实造成的，母爱怕不能这么说罢？不然，最初的人类如何能绵延到如今呢？当时是没有所谓社会习染的，最初的母亲，如何会自动抚育其子女呢？要问这句话，只要请你就动物试验试验。假如你家里有雌猫，当他生小猫的时候，你试把他自己所生的取掉，换几只别一只猫所生的小猫给他，他一样会把乳给他吃的。可见母猫的哺乳小猫，只是满足他自己的哺乳欲，哺乳欲是并不限于自己所生的幼儿的。人类远古的母亲怕也是如此。以当时人类能力的薄弱，倘使个个母亲都只肯抚育自己所生的子女，那怕人类真不会绵延至于今日了。”

《三国史话》的写作缘起于20世纪30年代苏北地区为了发展文化事业，吕思勉先生的弟子杨宽便邀请先生为其撰写一本《三国史话》。于是，1939年，《三国史话》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在《知识与趣味》上连续发表，成为抗战时期人们了解祖国历史的重要精神食粮。1943年，开明书店将16篇文章以《三国史话》为名发行，

这就是《三国史话》最基本的内容，其中包括《楔子》《宦官》《外戚》《黄巾》《历史和文学》《后汉的地理》《董卓的扰乱》《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曹孟德移驾幸许都》《袁绍和曹操的战争》《赤壁之战的真相》《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替魏武帝辨诬》《从曹操到司马懿》《替魏延辨诬》《姜维和钟会》，短短三年后，又刊印了第二版。

1946年，吕思勉先生又为《正言报》撰写了《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后来又称《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刊载于1946年5月3日。1947年，又先后为《现实周报》前两期撰写了《司马懿如何人》《司马氏之兴亡》两篇文章；同时还为《现实新闻》撰写了《晋代豪门斗富》。后来，此四篇以《三国史话之余》为名编在《三国史话》之后。而我们发现《三国史话之余》的四篇文章，其实都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如《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以《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为名刊发时，开篇便谈：“都邑的选择，我是以为人事的关系，重于地理的。南京会成为六朝和明初的旧都，这一点，怕能言其真相者颇少。读史之家，往往把史事看得太深了，以为建都之时，必有深谋远虑，作一番地理上的选择，而不知其实处于人事的推移，可谓求深而反失之。所以我在这里，愿意说几句话，以证明我的主张，而再附述一些我对于建都问题的意见。”《司马懿如何人》的副标题是“驾驭武人还是被武人牵着走？”，《司马氏之兴亡》的副标题是“恐怖政策对之手下人是成功的，用以对付政敌是失败了”，《晋代豪门斗富》的副标题是“从汽油的限制到五胡乱华”。从《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原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另外三篇的副标题都可以看出吕思勉先生

非常关注当下的重大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三、经久不衰的原因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三国史话》自从出版以来深受读者喜爱、经久不衰呢？我们认为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1. 选题经典，涉猎广博。

吕思勉先生选取了中国民众最关注的三国历史，自然读者群非常广。中国人为什么对三国的历史情有独钟呢？这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密切相关。吕思勉先生在《三国史话·楔子》中指出：“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它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国的斗争为主线，在历史内容、人物名称、地理名称、主要事件与《三国志》基本相同，当然对具体的人物事件进行了文学的处理。这对普及三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吕思勉先生说：“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由于《三国演义》中夹杂了中国人喜欢的兵法韬略等，谈三国甚至被认为是韬略智慧的象征。当然由于《三国演义》独特的文学处置，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美化、丑化等，往往对非历史专业人士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由历史学家依据可靠史料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种种谬见进行纠偏，自然会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引发的社会效应

也会更广泛。

《三国史话》属于发散性思维的书写。如讲到宦官，对人们普遍认识中的宦官进行纠偏。我们对宦官的主要印象就是明朝那些著名的宦官，而且将宦官等同于阉人，其实不然。吕思勉先生对宦官进行追本溯源，从文字学、经学的角度进行论述，引用《礼记》中的《曲礼》《文王世子》《王制》等篇章，论证三代时期的“宦”其实就是那些懂得专门知识技能的人，在机关中学习的公务员，并对宦的古义歧义进行了解释：“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且学习而得的。从其办事的一方面说，就是仕。从其学习的一方面说，就是学。”到战国时期，养士之风兴盛，那些“在贵族家里做舍人的，都谓之为宦”。这些舍人、门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这便是所谓宦官”。

宦官从东汉光武帝之后才全用阉人，那阉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吕思勉区分了古代的刑与现代的刑，从本义讲起：“在古代，必须用兵器伤害人的身体，使之成为不能恢复的创伤，然后可以谓之刑。”并解释了这种惩罚方式其实是从古代族与族之间的战争惩罚战俘而来，后来引入到本族的治理中。吕思勉先生引用《周礼》中的六官、五刑思想，对阉割之刑罚只针对男性及男性阉人为什么会备受帝王贵族的青睐进行了解释：“因为古代的贵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内室里要用阉割过的人。”而在集权社会中，皇帝居于权力的顶峰，往往难以相信任何人：“在历史上，有少数是因其性多疑忌，以为朝臣都要结党营私；只有宦官，是关闭在宫里，少和外人交接，结党要难些；而且宦官是没有家室的，营私之念也

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同时，宦官也乐于奉承皇帝，甘愿做皇帝的奴仆，“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份，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宦官》一篇短短四千字，梳理了宦官发展的简史，涉及的经书包括《仪礼》《周礼》《论语》，而历史跨度更是从远古时期、三代、战国、秦汉、隋朝以及清末慈禧时期。让人不禁赞叹吕思勉先生说理如此清晰，知识如此浩博，讲起中国历史如此兴趣盎然。

同样，在《外戚》《黄巾》中也展现了吕思勉先生深厚的史学功底。在《外戚》篇中讲道：“凡是和我们有血统上的关系的，都谓之戚。”“从父系家庭成立以来，父亲一方面的亲属和我们是一家人，母亲一方面的亲属却是两家人。夫妻之间，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内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却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团体以外的人，古人于其称谓之上，加一个外字，以示区别。”“亲戚分为两种：一种是父系时代自己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宗室。一种是母亲家里或者妻子家里的人，后世谓之外戚。”这就是外戚的由来。吕思勉先生又结合汉初的分封同姓王以及吕后专政等历史现象，让外戚问题更形象化。结尾处联系到制度建构的问题，而不仅仅将外戚问题停留在表面化的反思与批判，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

《黄巾》一篇，吕思勉先生却是在讲道教，五斗米道，对道家与道教进行区分，介绍黄老之术，并且讲到汉代非常流行的五德终始学说，尤其是结合不同时期的宗教对汉代道教的三种不同倾向进行比喻，尤为精辟，非有广博知识难以有如此恰当的比喻，通透的

解释：“须知宗教是有这三种。一种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动了他们，以图大事的，如近代洪秀全所创的拜上帝教便是。一种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确有些劝人为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时候曾经输入中国。后来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时候，人民仍有信奉它的。其教徒都不吃肉，而且还要互相救济，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维持一部分的信仰。还有一种，则是专和上、中流社会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余年以前，风行一时的同善社就是。这三件年代比较近的事，恰好和汉末的张角、张鲁、于吉做一个比喻。”

正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言：“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其读书涉猎之广，在这些篇章中可见一斑。

2. 大处着笔，见解独到。

《三国史话》所谈的都是三国时期最重要的话题，大气磅礴而不失精深。这与传统的三家村老儒短钉之学不同，更异于当今学界流行的碎片化史学。《三国史话》涉及董卓、曹操、袁绍、刘备、孙权、司马懿、魏延、姜维和钟会等重要人物，尤其关注曹操；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有宦官、外戚、黄巾、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荆州等问题。这些人物和这些事件才是整个三国时期的核心，我们试想这段历史抽出这些主干，必将索然无味，让人昏昏欲睡。如吕思勉先生在《赤壁之战的真相》中明确指出：“赤壁之战，是三国史事的关键。倘使当时没有这一战，或者虽有这一战而曹操又胜了，天下就成为统一之局而不会三分了。所以这一战，实在是当时分裂